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实辨析】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李佩文革经历考	华新民
【亡灵祭坛】	两代人的良师益友——怀念顾准伯伯	徐 方
【书刊评论】	吴一庆新著《边缘的文化革命》评述	杨松林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七）	王复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实辨析】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李佩文革经历考

· 华新民 ·

李佩于2017年1月12日与世长辞。她是我五十多年前的老师，（1）她的去世让我想起了她百年人生中的很多往事。其中，有一件事长存我的心头。那就是她是怎么度过文革中那些岁月的？尤其是，怎么会受到“隔离审查”的？

◇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时到底在哪里？

现在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常常用虚构的故事隐去了她受到隔离审查的经历，从而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就连官方大报《光明日报》在2015年11月26日发表的《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一文中也这么说：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接着还说：“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2）

这段故事似乎有见证人，还有感人的情景，不由人不信。查其作者，名叫“柯学源”，显然是“科学院”的谐音，给人以代表科学院的权威印象。幸亏，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谈庆明先生在致王丹红的邮件中指出了“柯学源”先生的谬误：

“郭永怀牺牲时，李先生是在科大的‘牛棚’里受审查，不是在外地工作，也没有闻讯回京。科大的军代表不敢把实情告诉李先生，而让李先生回家去，由力学所的军代表去告诉她。”（3）

郭先生因飞机失事殉职发生在1968年12月5日，当时笔者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玉泉路的校园里，可以确切地说，在文革运动的前期，即1970年科大搬迁到安徽之

前，李佩就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没有到外地工作。谈先生的辨伪同本人的记忆是一致的，也同我问过的许多当年在科大的师生的记忆相符。

实际上，王丹红早在十多年前的经过李佩本人审阅的文章中已经明明白白写了：

“1968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已经两个多月的郭永怀的电话，告知他明天就将回到北京。12月5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4〕

当时李佩的单位当然就是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尽管如此，近年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么胡编乱造，要么闪烁其词，所以谈先生说：“权威传媒一再以讹传讹，遗憾！这也对不起李佩先生呀！”〔3〕我想科大的师生和力学所郭先生的同事都知道李佩当时在哪里，“柯学源”先生这样的权威作者只要问一问这些人就会明白，但是偏偏还要说“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他在文末还弄巧成拙地加了一句：“王丹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 被遮蔽的真相：郭永怀因何而死

人们不免要问，明知是不实之辞，“柯学源”先生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心散布呢？恐怕只有一个解释：如果告诉人们李佩正在北京受到隔离审查的真相，不免又会牵连出另外一个真相，那就是谈庆明先生在同一封邮件里透露的：

“1968年12月5日，郭先生不是回京报告重要数据，因为关心数据的那些副院长在等着搭乘大飞机回京。郭先生没有必要回京报告。郭先生急着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要了解被关在‘牛棚’里的夫人李先生的情况。”〔3〕

这就把郭先生之死同李先生的遭遇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没有李佩的被隔离审查，郭永怀本来是用不着急于回京的，他本来是可以同其他同事从容地坐大飞机安全回京的。

李佩心中当然明白1968年12月5日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明白郭先生为什么要坐小飞机匆忙赶回北京。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曾经选择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1〕——她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案子连累了丈夫，使他死于非命。后来虽然获救，相信这种强烈的自责和内疚伴随着她的后半生。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坚持要把郭永怀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骨灰和郭永怀的骨灰安放在一起，因为她认为牟方东也是受她的牵连而死的。

可见，郭永怀之死同李佩在文革中受到隔离审查有极大关系。那么，李佩为什么会被科大隔离审查呢？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文革在1968年那个时期的社会“大气候”。

◇ 李佩为何被隔离审查？

粗略地说，文革的最初两年时间，其“主旋律”是打倒走资派，是“革命群众”把矛头对准各级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斗争。这个时期，在高等学校里，像李佩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运动的对象，他们中有些人在文革最初的一两个月中被“横扫”了一下，不过此后一段时间则还算平安无事。

但是到了1968年，各级革委会都已建立，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其“主旋律”开始变调，斗争的对象中加进了“叛徒”、“特务”、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等等，“走资派”成了一个相对靠后的罪名。具体到大学里，运动以来一直保持低

调、处于边缘的教师中就有一些人被“揪”了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其中年长的、地位较高的教师。他们多数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有“旧社会”经历，甚至有过较高的地位，同国民党政府的高层有或多或少的来往。这些都成了需要清理的历史污点，罪名常常是：“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国民党特务”，如果有海外经历，那就逃不掉“外国特务”的罪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1968年6月24日，在支左部队领导下，校革委会作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几项规定’，学校开始‘清队’。”〔5〕相信李佩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隔离审查的。

文革中有海归经历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扣上“特务”罪名是司空见惯的事，以致可以用这样的对联来形容：“被捕出狱是叛徒，留学归国皆特务——基本如此”。李佩的遭遇也不算例外，还有一个同她的遭遇十分相似的例子，那就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研究生罗时钧先生，他在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文革中他本人和在同校任外语教师的妻子双双被打成“美国特务”，他妻子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假如郭永怀先生不是因为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特殊任务而受到中央最高层保护的话，和罗时钧夫妇一样的命运也会落到他和李佩的头上。

不过，历史真相的探究需要有细节的实证，仅仅根据普遍的情况来推断李佩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显然是有失严谨的。然而，严谨的考证需要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不知道李佩的文革档案资料现在是否还保留在科学院或中国科大的档案室里，即使保留，也不可能公开。至于当年参与审查她的人员，多为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成员，即使今天还在世，也无从查访。

李佩被审查的案子还有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地方。那就是，在郭永怀因公殉职后并没有解除对李佩的隔离审查，而且审查一直延续到科大搬迁合肥以后，其间还发生了她自杀未遂的事件。要知道她这时已经是烈士家属，据说周恩来很关注郭永怀牺牲的事，只要周恩来说一句话，她本来是可以免除这些苦难的。从这些迹象来看，李佩的案子不像是普通的那种“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海归特嫌案。这些年，这个疑问一直盘旋在我的脑中，近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信息给我提供了追寻的线索，得到了一点可以作为考证依据的资料。

这个线索要追溯到笔者在2010年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文革中的钱学森》的文章，刊载于周刊《记忆》上。〔6〕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华裔作家张纯如的钱学森传记《蚕丝》一书（英文原版 Thread of the Silkworm），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该书一段文字的内容：

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

当时阅读这段文字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曾猜想这位隐名女士的母亲是谁呢？会不会是就是李佩？但是我知道李佩是钱学森的老朋友，然而不能算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此不敢断言，成为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疑问。2015年，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的科学史教授、友人王作跃看了我的文章后告诉我，他看过张纯如的一些遗稿，其中有她为撰写《蚕丝》所作的采访笔记，我在文中所引用的那段文字，正是源于李佩的女儿郭芹对张纯如

的诉说。这才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误读：张纯如在书中把这位隐名的女士称作“the protégé's daughter”（老部下女儿），实际上已经泄露了郭芹的身份——钱学森的部下（protégé）郭永怀的女儿，然而因为此书只提到此女士和她的母亲，我误以为这位“部下”所指的是她的母亲，从而不敢断定她们母女的真实身份。（作者注：严格说，protégé一词是门生、部属或受保护者的意思，张纯如用此词来叙述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关系不够恰当。）

王作跃教授传给我的有关笔记里有一段郭芹跟张纯如的对话：

张：你妈妈遇到麻烦了？

郭：是的。说来话长，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当了邮电部长。他是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的。但是江青恨他——江青把很多她恨的人送进了监狱。我不清楚他是否还活着，但是知道他姓朱。我妈妈当时被蒙在鼓里，但钱夫人却教训我，我觉得无法理解，我以为她们是好朋友啊！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他们是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文革以后，我妈妈和钱家竟又成了好朋友。

综合上面张纯如在书中公开透露的郭芹访谈以及这段没有公开过的笔记，我有以下几点解读：

1、李佩是因为受到邮电部长朱学范案子的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相比起来，“海归特嫌”并不是主要原因。没有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张纯如不懂中国政治审查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所以在文中笼统地理解成是“朋友”。

2、钱学森夫妇知道朱学范是江青仇恨的人，他们大概也听说了李佩历史上确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相信李佩案的严重性，从而在郭芹面前批评李佩“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加上钱学森本人因为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遇到了麻烦，1971年正是他在政治上处于低谷，因而特别谨慎小心的时期。（6）

3、李佩案的上述内情和性质是钱学森夫妇通过某种渠道得知的。他们将其告诉郭芹，是希望她心里有底，跟母亲划清界限，目的是为了帮助亡友郭永怀的女儿，让她远离迫害。有理由相信，在郭永怀殉职后，他们出于关心，曾经向有关方面询问过能否解除对李佩审查——毕竟，李佩是烈士家属——而有关方面向他们透露了李佩的案情，使得他们知难而退。

4、郭芹无法接受钱氏夫妇在自己面前如此严厉地说母亲的坏话，误解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以为是对她自己的冷淡。她对于文革后母亲同钱氏夫妇重归于好似乎也无法理解。说明郭芹的天真，对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人情世故缺乏认识。

以上解读和推测得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集《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的印证。这本影集是2016年10月，即李佩逝世前三个月出版的。它的编委都是郭永怀和李佩生前的同事或学生，他们笔下的李佩的经历——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经历——比那些权威媒体和“柯学源”先生要准确得多。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影集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李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主编郑哲敏院士在序中说：“‘文化大革命’中，她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隔离审查，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莫大侮辱和折磨，时间有6年多。”（7）该书第86页记载了李佩在科大的文革期间所遭遇的劫难：

随着运动的发展，被审查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尽管郭永怀因为承担着核试验和重大国防科研的任务而受到特殊保护，但李佩还是没能幸免。1968年，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李佩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及美国留学的经历而被诬陷为“特务”，受到单位造反派的迫害，被送到劳改队接受审查、劳动。（7）

这里显示了李佩之所以受到审查，大环境是由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首要原因是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而“中国劳动协会”正是在朱学范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据王丹红向李佩本人了解，李佩在1941年大学毕业后直到1947年初赴美留学，一直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其间朱学范是该协会理事长，1945年，李佩曾随朱学范率领的代表团出国参加过世界工联的会议。（8）

而朱学范在文革中是邮电部的“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的主犯。查网络上的秦城监狱记录，朱学范是在1968年8月23日被秦城监狱收押的，这个时间大体上同李佩在科大受到隔离审查的时间相符。所以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李佩的麻烦源于她跟朱学范历史上的关系，不是他们的猜想，而很可能是来自高层的权威信息。

2、影集也如实透露了郭永怀之死跟李佩受到审查之间的关系：

10月3日郭永怀离京去青海基地。（86页）……郭永怀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李佩的处境。1968年12月5日，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郭永怀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到达北京机场400米上空时，突然失事。（88页）（7）

可见，郭永怀是在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而不是跟其他领导人那样等试验完成后再回北京，并不是如“柯学源”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2）。而是因为李佩的处境让他牵挂，希望早日回到北京对李佩有所帮助。

3、影集还记录了对李佩的审查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即使在郭永怀遇难后，她的处境也没有得到改善，在隔离审查中跟着学校搬迁。该书第92页记载，1975年，当时的中科院科研组长郁文到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视察，所长邱励俭（曾是郭永怀的学术助手）前一天把李佩接到所里，安排李佩同郁文一起吃饭，据李佩回忆：

“郁文看见我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还在合肥。当他得知我在科大受审查还没有结论后，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回北京去，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汇报一下，把你调回北京。’”（7）

但是，当年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主持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和李昌都失去了权力，李佩的案子又拖延下来。直到1976年秋，她才离开合肥回到北京。

需要指出的美中不足之处是，影集86页文中所说的李佩受到“造反派的迫害”，并不符合事实。1968年7月末，毛泽东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全国从此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运动前期叱咤风云的造反派退出舞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

“1968年8月9日，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学校‘斗、批、改’。8月20日，第

二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学校。”“8月23日，……经过工宣队、军宣队做工作，本校两大派群众组织延安公社、东方红公社于是日相继宣布解散。”〔5〕

所以，到1968年8月下旬，科大跟全国所有的上层建筑单位一样，权力已经掌握在进驻学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手里，革委会中即使还有一些造反派代表，也要听命于工宣队和军宣队。科大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在北京和安徽的军宣队、工宣队先后领导下进行的，李佩的施害者是谁？不言而喻。

◇ 朱学范是谁？

那么朱学范是什么人呢？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年轻时在上海邮政局工作，在那里开始从事工人运动。那个时候笔者的外祖父恰好也在上海邮政局当邮差，记得我母亲和姨妈有一次议论到朱学范时说，一向本份的外祖父称其为“小偷乱”——上海话里指那种不安分守己、办事不牢靠、喜欢添乱的年轻人。

互联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朱学范从邮政局的工人运动起家，后来在邮务工会、上海市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等工会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工会组织都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他本人也是国民党员，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和中国的劳工组织出席国际会议，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正式理事，做到世界工联副主席。朱学范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中，站到了反蒋阵营一边，参加创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使他成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在1949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邮电部长，而且安然度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文革中的1967年8月，邮电部实行军管，他才被停止了部长职务。一年后，他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特务集团头子”，投进秦城监狱，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捕后才获得平反。

朱学范在文革中遭到冲击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像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的那样，是因为江青恨他，很难确证。了解邮电系统、邮电学院文革的人或许能够对此问题作出更确切的回答。

从表面上看，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演艺事业，与朱学范成为上海工会组织和帮会势力的头面人物，两者时间上正好重合。我们知道，江青对于所有知道她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心存忌恨，所以钱学森夫妇的话大概是有来头的。如果这真是朱学范案的深层原因，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出面替受到朱学范案牵连的李佩开脱——文革中凡是背后有江青主导的案件，周恩来都会保持距离，哪怕他自己的兄弟和养女孙维世身陷囹圄也没有出手相救。李佩为什么在成为烈士家属后还不能解脱，而且还要随着学校南迁继续接受隔离审查？为什么她的案子久拖不下结论，到后来竟然无人过问？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由此可以得到部分解释。

当然，朱学范被捕入狱即便有江青介入的深层原因，也是不会明说的，表面上一定是拿他在民国时期的经历说事，而他的这段历史确实有许多很容易抓的把柄。他当年领导的工会组织，并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倒是与黑社会有很多关系，在共产党掌权后，这类工会通常都结束或取缔了。尤其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捕杀，朱学范却在1928年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且投靠到杜月笙的门下，成为上海滩青帮中的重要角色。据他自己在《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一文中回忆，每当发生工人罢工、劳资纠纷中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他就会去请杜月笙出面调解。这样的历史问题到了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是很现成的反革命罪名。

毛泽东在1968年春季发表了关于文革的新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朱学范这样经历的人成为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靶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朱学范成为国民党特务集团头子进了秦城，殃及当过他助手的李佩。李佩被隔离审查，牵动了远在核试验基地的郭永怀。郭永怀急于回京替妻子解脱，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一位世界一流的中国科学家的非正常死亡，发生在文革“主旋律”变调的时期。理解了其中的关系，不免让人感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文革没有迫害郭永怀，郭永怀却因文革而死。

注释：

〔1〕华新民：《哀悼李佩老师——我的个人记忆》，《华夏文摘》网，2017年2月8日。

〔2〕柯学源：《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6日

〔3〕王丹红：《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1月24日

〔4〕王丹红：《李佩：在平淡中传奇》，《科学时报》，2003年4月8日

〔5〕《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址：
<http://arch.ustc.edu.cn/memorabilia.htm>

〔6〕华新民：《文革中的钱学森》，网刊《记忆》第43期，2010年2月27日

〔7〕《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郑哲敏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8〕王丹红：《李佩的青春之歌：家事国事天下事》，《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3月8日

□ 原载《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7-02-12，责编：李晓明

~~~~~  
【亡灵祭坛】

两代人的良师益友——怀念顾准伯伯

· 徐 方 ·

最近，收到友人寄来的《顾准日记》，一口气读了多半本，最后竟泪如雨下！《日记》中的一些片断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接连几天夜不能寐。心里有种冲动，要把这些事讲述出来。

说到跟顾准伯伯的交往，必然涉及到我母亲张纯音，她跟顾伯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通过她认识并了解顾的。本文所记述下来的这些，一部分是笔者的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母亲生前的回忆。

## 一、母亲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1943年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一九六二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

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文章是上面布置写的，写好之后，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等人还在后面署了名。

六二年的经济所办公地点在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白色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从干校回来后，一次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顾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文革初期，顾伯伯受到更大的冲击，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人不备，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从干校回来后，顾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须知当时我险些没钱吃饭了。”

69年底，经济所下干校，母亲继续暗中与顾伯伯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她曾提到这样一件事：72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为送弟弟回京，须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顾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上面。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母亲把林彪事件一股脑地道出。他说：“我对党内这些派系斗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顾伯伯生前和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他的思想、学术观点、乃至人生观对母亲无不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曾谈到过对中、西医的看法。顾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我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可是74年11月，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西医宣布已无能为力。林里夫伯伯找了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可谓有病乱投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轿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轿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骆耕漠伯伯找了他的老战友解决了车子问题。药煎好后，母亲端给顾伯伯，说：“把这药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顾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从上述事情可以看出，母亲对顾伯伯的认识、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过，早在“文革”前就能认识到顾准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并冒着受牵连的危险，跟这位两度戴上右派帽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倒霉蛋”做朋友，在精神上支持他，在生活上照顾他，这在当时可以说极其难能可贵。母亲与顾伯伯的友谊是建立在思想上高度理解、精神上高度沟通的基础上的，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的。

## 二、干校生活

我是在1969年11月随母亲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干校时认识顾伯伯的，当时15岁。

那个年代全国学习解放军，学部各个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为五连，经济所是七连。学部有十几个研究所，两千点左右，还有家属，一下子都开下去不行，得派个“先遣部队”打前站。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下吧。于是我们就这样先行了一步。

刚下去时没有现成的住房，经济所全体男同志都集中住在一座棉花仓库里，女同志则安排住在公社粮管所。也许是年纪小的缘故，我感觉那仓库硕大无比，里面用粗木头搭成类似脚手架的架子，再铺上床板，构成大统铺。仓库本不是为住人盖的，只在高处开有几个小窗，东西两扇大木门上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暗，白天大门总是敞开着。当地没有电，晚上以马灯照明。全体人员每天中午、晚上到仓库集中吃饭，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场面蔚为壮观。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对我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曾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被隔离审查，临下干校时才得知夫人已自杀，孩子又都跟他断绝了的关系。他的心情坏极了，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在那里默默地吃着。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顾伯伯。我发现他很少讲话，总是拼命地干活。几年后，我们一起回忆干校生活，他说当时精神正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刚下去的时候，整个气氛“左”得出奇。尽管当地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可干校的伙食却很差，每天清汤寡水，不是萝卜熬白菜，就是白菜熬萝卜，几乎见不到肉。据说是因为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两个月下来，人们渐渐撑不住了。一次董辅初叔叔发牢骚说：“肉都让资产阶级吃了，无产阶级吃什么？！”幸好下来前妈妈料到干校生活会很艰苦，买了一些肉罐头、奶粉、肉松等食品装在箱子里，这时解决了大问题。她想到顾伯伯也同样需要营养补充，应当给他送一些吃的。可是顾的处境极为恶劣，经常挨斗，没人敢跟他说话，更别提送东西了。想来想去这件事只能由我来做。那时我十几岁，在大人眼里还是个孩子，不引人注目。我趁大人出工的时候悄悄溜进男宿舍，把食品藏在他的被子里或床底下，然后找机会告诉他。一来二去，慢慢熟了，在没人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

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的严重性。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进度，只有我一个人例外。一天上午，我在棉花仓库里给同学讲正负数和一元一次方程。晚上顾伯伯对我说：“今天生病没出工，你讲的课我全听见了，能把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讲清楚很不容易。我也是从十几岁开始做小先生的，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人道是‘教学相长’，教书对自学很有帮助，能把学到的东西理得更清楚。”接着他又问我数学学到哪儿了，我说学到几何了，可惜没圆规，不好画图。他二话没说，打开自己的箱子，从里面翻出一个扁平的黑色皮盒。我打开一看：啊，藏青色天鹅绒衬里上，整齐地排列着各种不锈钢圆规和其他绘图工具。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制图仪，不敢接。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拿去用吧，用完后还给我。”后来我才知道，顾伯伯的数学根底很深。下干校时他的行李很简单，却随身带着这套绘图工具，可见他对学问的执著。

顾伯伯不仅在学习方面指点我，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对我来说也是做人的楷模。干校期间他尽管是斗争对象，却颇有几分傲骨，从不卑躬屈膝。有一次开完批斗会，他对我说：“别看我前面头都快低到地上了，其实后面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开别人的斗争会时，他总是拿个马扎，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次另一个右派虽然自己多年来也是批斗对象，在斗争别人时却坐在第一排，非常起劲地高声喊着：“低头！低头！你要老实交代！”顾看了颇不以为然，事后对我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这些事说明顾在干校期间，对当时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有很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始终有客观的评价，对别人也绝不落井下石。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最近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夫妻为“革命”反目为仇，儿子“大义灭亲”揭发、斗争老子的事时有发生。顾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有思想的人要记下点儿什么，绝不可能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必然写些官样文章。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保护自己，要随时准备日记一旦被抄出，里面的话都能“摆到桌面上”。因此，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尺度来解读当年写下的东西。另外，顾伯伯始终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以满腔热忱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生产建设，为每一点发展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些都渗透在《息县日记》的字里行间。若认为这是在“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过于失之偏颇么？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社会大学堂里，经过顾准伯伯的言传身教，我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逐渐成熟起来，人生观慢慢定型。可以说顾伯伯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三、回京后的相处

七二年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同住在这一层楼上。这时，运动重点已转向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死老虎”。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晚都与他长谈。顾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顾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

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辩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经过多年的痛苦思考，顾伯伯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一整套思想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故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读他的遗著，还会感到深受启迪。一次他对我们说：“我感觉自己就象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写到这里，我的心一阵绞痛。我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遗憾的是上帝竟如此不照顾他，刚开始工作两年，病魔便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顾伯伯在学术上很注意跟上时代。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景涛先生（已故）。宗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宗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资料，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于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不断地进书，顾不断地读书，这种现象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时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景涛功不可没。

顾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门生是吴敬琏，其他人还有赵人伟、林青松、周叔莲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七十年代初，我随父亲去兰州。为躲避上山下乡，考入甘肃省歌舞团拉小提琴。七三年因患肝炎回北京养病。这也是我跟顾伯伯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跟妈妈一起到顾伯伯那儿谈天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那时我十九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

一天，伯伯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做什么。当时我正在自学英语，同时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文科书籍。那个时候还没有考大学这一说，依我的初中文凭，没敢多想，于是回答：“想当小学教师。将来要是有机会，能翻译一、两本有价值的英文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就很知足了。”他听了以后直摇头，说：“你给自己订的目标太低。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等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今天回想起这些话，虽然是对我的指点，实际上道出了他自己的人生观。他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跟顾伯伯也是好朋友。他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七十年代初从水电部干校分配到兰州修造厂。厂里指派他做翻砂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那些年月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去王府井外文书店购买大量国外最新资料（影印本）。父亲回来

后，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发现顾伯伯每天都去图书馆，就跟他商量能否借用一下他的地方，顾欣然应允。于是每天早上顾去北图，父亲去顾的房间读书，晚上顾回来，父亲再把地方让出来。有时父亲买一些酒、肉、小菜请顾伯伯吃，跟他谈天说地。父亲在北京探亲一个月，看了一个月书，拉了一个月计算尺（那时还没有计算器，更谈不上计算机）。顾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非常感慨，问我：“你将来是想做父亲那样的人呢，还是做母亲那样的人？”我跟母亲很谈得来，颇受她的影响，于是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是想做母亲那样的人。”他说：“我看你还是做父亲那样的人更好，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国家建设正需要这样的人材。”

顾伯伯告诫我：“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能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今天读过顾伯伯遗著的人都会发现：他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于任何人。

他还提醒我说：“你现在很努力，这很好。不过作为女人一生要过两关：结婚和生孩子。

多数妇女结婚后就不再搞事业了，一心扑在家里。而生孩子后仍能坚持搞事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希望你将来能够闯过这两关。”

一次他问起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说：“别的我不知道，单凭他解放后干的这些事，可以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顾说：“你的看法不全面。依我看他这个人年轻时是英才，晚年时的昏君。”接着他解释道：“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工作，有时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不知该怎么做。这时毛可能会写一篇文章，就此问题加以论述，往往令人茅塞顿开。你想想，当时跟着他闹革命的人当中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他要是没有两下子，别人也不会服他。可惜这个人只会打天下，却不懂国家建设，总是搞搞好，弄弄乱，搞搞好，弄弄乱……”

那段时间，顾伯伯在谈天中，偶尔也回忆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刚解放时他们进驻上海，组织上分配他住一座小洋楼。房主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前夕携全家逃走。他看到房子里有全套高级家具，感觉不妥，认为应当上交。他母亲多年一直过苦日子，不同意交。他是个孝子，心里很矛盾。为了说服母亲，甚至跪下了，解释道：组织上分配的只是住房，并不包括这些家具。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叫人把家具拉走了。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今天，很多共产党干部腐化了。顾伯伯当年的清廉与现在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次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帐。为了收税当时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有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给我配了两个警卫员，整天跟在身后。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为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当谈到他蒙冤的问题时，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法，我是申诉无门啊！”

#### 四、诀别

74年夏，我的病略有好转，返回兰州工作。在此期间，常和顾伯伯通信。我在信中一如既往地请教各种问题；他回信对每个问题都悉心解答，并勉励我努力学习，日后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一天，接到母亲的信，我满心喜悦，可看到的竟是这样的内容：“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已宣告无能为力……”犹如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倒在床上嚎啕大哭。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伯伯这些年来历尽磨难、家破人亡，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可以从事探索研究，把经过多年思考、日臻成熟的思想写出来，你却这样快就要夺去他的生命！

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北京去看他，可是……万般无奈，只好给他写信。以下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的片断：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的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信寄出后，我每天怀着焦急的心情默默祈祷：伯伯，你可一定要挺住啊！明年春天全国文艺调演，到那时就能见到你了。可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十几天后，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顾伯伯于12月3日凌晨病故。

顾伯伯就这样永远离我而去。对于母亲和我说，失去了一位极其难得的良师益友，为此痛心不已。

屈指算来，从认识顾伯伯到他去世一共五年。在这五年当中，我每一点一滴的进步，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七七年底，当我捧着“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时，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深知要是没有当年顾伯伯的指引，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这一天。伯伯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吧？

~~~~~

【书刊评论】

吴一庆新著《边缘的文化革命》评述

• 杨松林 •

学者对于历史的分析和评价，总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倾向性，但历史事实本身却又是客观而不带有偏见的。因此，在历史事实本身与历史分析两者间达到一种不被成见束缚的相

对平衡，就成为了众多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简单地说，跨越左右成见，需要打通历史的断层；而历史断层的被打破，同样也需要有不囿于左右成见的态度和意识。

也正因如此，观点的保守和激进，以及过去与现今社会的断裂与连续，构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两个基本维度。处理好这两个平衡，需要在研究角度、理论引用、史料分析上做到批判继承，不全盘否定，也不“拿来主义”。在这个层面上，吴一庆的《边缘的文化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一书，或许能为此提供新的思路与范式参考。

吴一庆，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终身教授，从事当代中国历史、社会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以文革与毛泽东时期为主攻方向。

吴一庆的新著《边缘的文化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201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引发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关注，并且吸引了中国区域研究之外，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学者的极大兴趣。其独特的跨学科理论视角及扎实的一手历史材料使其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学术著作奖（SSHAr President's Book Award）。他的文革研究，从历史连续与断裂的复杂性出发，改变过往将文革和改革开放隔断的观点，重新认识晚期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在对于社会阶级分析方法的使用中，他能做到批判和继承相结合，既不全盘否认其作为方法论的特有优势，也尝试摆脱其固有的僵化和机械的不足。另外，在当今西方学界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思潮极为盛行的气氛下，吴一庆的研究，一方面汲取了学术界近几十年来对于阶级、民族主义等总体性概念所包含的决定论、西方中心、现代中心主义等危险性的集中检讨和反思；另一方面，亦有意识地摆脱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过度沉迷于文本和过度碎片化的理论局限，尝试通过发掘与重新解释文革中的民间思想，来重构社会运动及革命的历史可能性。通过一种对于文革和现世两段断裂历史中连续性的解读，他的目标，显然也在于对于现世的批判。

◇ 文革研究的新思路

历史的书写和历史事实本身并不完全一致。历史的叙述和书写，很大程度上和叙述者个人的背景与社会背景相关。正因为如此，历史叙述很难不带有个人的倾向性，从而轻易地被卷入二元对立的左右阵营中。这种带有极大局限性的划分，不但影响读者对于叙述者观点理解的全面性，更阻碍历史表达的相对客观性，造成历史事件和历史书写的进一步分离。

这种情况在文革史的研究中，同样如此。在改革开放的正当性不断被确立的同时，文革作为改革开放的“他者”，被定义为与之对立的负面标靶；同样的，也有部分学者在对改革开放所出现问题的批判中，对文革历史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单面的用“革命”来批判“复辟”。而这种类似于贴标签的行为，在分析文革中，被赋予了所谓“政治先定论”的倾向，但这和历史书写追求的相对客观性要求所违背。如何处理这种线性历史观和“目的论”的研究方式，超越带有偏见的历史书写，是吴一庆在其著作中不断思考而力求改变的。

吴一庆的分析方式和其在西方的理论训练中受到的后现代氛围密切相关。这种对于旧有线性叙事和僵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予以复杂化分析、解构，重新思考中心和边缘关系的混杂（myriad）、缠绕（entangled）的方法，都在这本书中有着类似的体现。事实上，在这本书中对于上述后现代分析术语的多次使用，都能证明吴一庆希望通过对文革权力中心和边缘关系的复杂化处理，解构传统研究过分强调“边缘对于中心的绝对服从，而忽视其自身的能动性”的观点。他甚至进一步认为，当年一些身处政治边缘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在政治层面更为深入而理智的解决方案。（2）

文化大革命所反对的官僚特权，事实上在建国后，一直在逐步形成。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保有对国家官僚化的敏感和警觉。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但由于完整的官僚阶级本身并未形成，加上其阶级形成的过程受到当时社会主义的种种因素限制，导致民众对于权力官僚化以及新精英阶级形成过程理论认识的局限。

“在某一特定时间或历史横切面上（例如1964年的中国），统治阶层未必已经演化为一个发育成熟的资产阶级、或完全成形的统治阶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潜能往那个方向发展。某些结构性的内在发展趋势，因原先受到各种历史因素（例如大众斗争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等）的压制而暂时处于潜伏状态。但是，一旦环境或土壤‘成熟’的时候，一旦有了新的制度机制（比如市场）为之提供条件，它们就会蓬勃发展起来，甚至获得突破性的发展。”〔3〕

这一点对于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计划的失败及其包含的内在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晚期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缺陷和悖论，很大程度和其所企图反对的“官僚阶级”密切相关。毛泽东似乎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官僚阶级的趋势会阻碍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这种意识使得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但由于这种官僚化与统治阶级尚未完全发育成型，这导致了晚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局限。〔4〕

其次，也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文革时期毛泽东和红卫兵运动关系的复杂关系，使得中央在处理和群众运动的关系上显得前后矛盾。事实上，在文革中，毛泽东以双重身份出现：他既是领导群众运动的领袖，又是群众运动所挑战的权力体制的代表。毛在文革初期曾将自己比喻成“老虎和猴子的结合”〔5〕，很能体现出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关系。

这种矛盾，对于解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行为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类似“先放后收”的做法，在吴一庆书中的三个个案研究（遇罗克和北京红卫兵运动中关于“血缘论”的辩论，上海“一月革命”，以及杨小凯与湖南“省无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三个例子其实是相互关联的。首先，遇罗克在面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充满了政治歧视的论断时，以其著名雄文“出身论”予以反驳，呼吁政治的平等。吴一庆认为，遇罗克对于国家强加的政治分类（即“红五类”）的挑战，包含了“一种新的对于阶级关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和分析方式”，这超越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毛泽东思想的底线。〔6〕

两者虽然有着挑战官僚阶层的同样目的，但遇罗克的思想将“人的尊严和可能性放置于社会主义的核心地位”〔7〕，这对于文革领导阶层而言显然无法接受，也正是因此，遇罗克最后遭到了极刑。

由“血统论”问题的辩论出发，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阶级关系这一尝试是重要的。它的最终夭折，并不意味着群众运动对于社会主义官僚化的反思与批评的终止。事实上，在上海“一月革命”中爆发出来的大规模“经济主义”风潮（工人要求涨工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回城等等），以及杨曦光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不平等更为系统的批判尝试，都和遇罗克的思想有着政治逻辑上的关联。上海一月风暴中“公社制”尝试的失败，以及对于工人社会经济诉求的压制，刺激了随后更为深刻的批判；北京红卫兵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四三派”对于“联动”血统论主张的批判，很大程度受到了遇罗克思想的影响，这在后来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及湖南“省无联”对整个社会主义官僚体系的批判分析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但这些民间批判性思想的萌芽，民间批判性思想的传播，以及在群众运动中的影响，让毛泽东和其他高层领导意识到了“一种可能会导致不可预见、且无法控制的

大规模动乱与广泛的社会对立”〔8〕的巨大政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阶级对于行动的镇压也就不难解释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遇罗克对于“血统论”的批判，及由此引申的对于官僚阶级的批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批判逐渐从边缘走向了政治中心；经过不断的政治斗争，逐步形成对于整个统治系统的反思，由此引发出了挑战整个统治阶级合法性的可能性。也正是随着这种思想的不断发展，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这种思想逐步转变为压制，这当然不能排除毛泽东对于红卫兵运动无法控制的担忧，但更大程度上，亦在于其思想本身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上述批判的失败。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革“中心—边缘”关系的分析和解读，吴一庆尝试重新思考群众运动和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由此，在反思文革中，我们不仅能重新发现当时权力关系的复杂化，不以标签成见来肯定或否定文化大革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沿着“官僚化”的内在理路，去思考和批判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打通人为造成的历史断层。而这便和下文他对于当代中国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现世批判相关。

◇ 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现世批判：如何打通历史断层

如上文所言，这种逐步形成的官僚阶级，在文革时期由于未完全形成，加上意识形态、群众运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其被压制而暂时处于潜伏状态。但这种潜伏状态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就有可能被激活，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而后来的市场化进程、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建制组织机构，便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沿着官僚阶级形成过程这一线索出发，我们便能发现，正是因为资本和官僚化的结合，促成官僚阶级的最终形成及巩固，由此造成的公权私有化、腐败、贫富差距及一系列其他社会矛盾便得到了政治学层面的解释：

“在中国，市场化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既有统治阶级特权的扩大与加剧。资本和权力间的非神圣同盟标志着新的阶级联盟关系的形成。特权在一个对官僚权力‘相对友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和出路，从而更进一步恶化和加剧了市场自身所带来的不平等。

因此，如果我们说是市场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话，那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它为官僚统治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崭新的、更为有利的机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可能只是一些尚未明显定型的趋向或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的趋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会逐步分化、加速发展、甚至于有所突破，而所谓的市场，正为其提供了‘友善’的条件和环境。”

如何解决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构性难题”？吴一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他也表示自己并没有提出解决现世困境的意图，因为这超越了自身的学术范围。当然，更重要的是，吴一庆在进行现实问题的批判中，能打通历史断层，跨越左右成见。这种历史意识，对当今思想界仍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另外需要指出，吴一庆对于这种历史的连续性解读，也和福柯对于历史非连续性的解读相矛盾。但正如德勒兹所言，“历史的断裂性包含着局部的连续性”，这种“局部连续性”的解读，并不代表其对于非连续性的反动，而更多的是一种印证。这里需要一并指出，以防止不必要的误读。

总的来说，在处理评价中的左右成见和历史中的断裂与连续这两对矛盾中，吴一庆重新探讨作为总体性的阶级，顺延后马克思主义—葛兰西路径重新解读了社会主义以及文革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发展出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批判。而通过这一解读和重构，最终形成对当今“市场社会主义”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批判反思。概括来说，就是“既反市场又反国家”。作为横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并且受到两方承认的学者，吴一庆的历史研究包含清晰的现实关怀和现世批判，而其对当代社会的反思又扎根于丰富扎实的经验研究，这一学术旨趣和思考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学习。

参考文献：

〔1〕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书信，转引自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xv.

〔2〕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在接受采访时，吴一庆表示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创造出了一种绝无仅有的政治空间，这种政治空间虽然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转化为“权力的社会化”，但依然包含着某些可能性。

〔3〕吴一庆：《重新解读“资本主义复辟”》

〔4〕同上注。吴一庆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官僚化的病症，但他对病因的诊断是错误的，给出的药方也是很有问题的。”

〔5〕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书信，转引自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xv.

〔6〕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93

〔7〕同上注，93

〔8〕同上注，189

□ 原载《破土网》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七）

• 王复兴 •

（上接 z k 1 7 0 2 b）

## 第六章 继续大乱的1968年

### 1、坚持大联合，抵制孙蓬一

1月10日，扬子浪在他公布的日记中写道：“北大斗争相当复杂。解决井冈山问题和校文革问题是一样困难的。对校文革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领导必须坚决抵制，作合适的斗争。”（注1）扬子浪的这段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新北大公社文攻作战部”和“新北大人写作组”这批人坚持大联合，反对武斗，与校文革中以孙蓬一为代表的错误思想坚决斗争的立场和态度。

1月16日，“公社”召开串联会，讨论形势。会上我、扬子浪、索世晖、陈双基都作了发言，批评了“公社”中一部分人提出的错误口号：“丢掉联合幻想，坚持斗争到

底！”、“安不忘危，捍卫红色政权！”、“与井冈山之间的路线斗争，绝不能调合！”等等。指出这些口号与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相违背。目前的任务应是做艰苦细致的工作，防止发生武斗，争取实现大联合。我们这些意见当场遭到很多人的指责和反对。当时我们的这种声音，在派性高涨的“公社”中很微弱也很异类。在这次串联会中，我们这批人做为“策略派”，在“公社”内部亮相了。

1月16日晚，“井冈山”部分人抢走了校文革公章，抢走了“公社”广播站的喇叭，干扰“西藏大联指”演出队到北大的演出。“井冈山”挑起武斗，好在“公社”很快恢复了秩序，演出顺利举行，才旦作玛也做了精彩表演。“井冈山”这些派性顽固者的作为，使我们“公社”的“策略派”很被动，使我们争取实现大联合的努力愈发困难。

1月17日，在留学生食堂，“公社”的“红色进军号”战斗队发起炮轰“公社”总部“右倾”的串联会。许多人强调“公社”在武斗中受了损失，对“井冈山”软弱，指责总部“右倾”，不指名攻击“作战部”和“新北大”。我们据理力争，进行了反批评。扬子浪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孙蓬一们再也无法统一意见了。”“能不能坚决打倒派性，能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衡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准。”（注2）扬子浪的这段日记反映出“公社”的“策略派”，已觉悟到必须把“坚决打倒派性”做为斗争目标。

“策略派”虽然是“公社”内的少数派，但能量很大，信念坚定。“策略派”最有利的武器是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这些指示的重点就是：停止武斗，消除派性，实现联合。这正符合我们当时内心的朴素想法：结束乱斗，恢复秩序，走向正常。但当时北大两派的派性十分顽固，实现联合极其困难。但两派的大部分人对这种旷日持久的派仗并不满意，因此逍遥派日渐增多，大多数人采取了脱离运动、消极抵制的态度。但两派的头头大多是派性顽固的激进派。当时的形势是：谁激进谁话事，谁调合谁靠边；少数人热衷派仗，大多数人遥遥观望。这便是当时北大的生态环境。

据赵建文讲，1967年10月至12月时，聂元梓收集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许多文章、“社论”，反复阅读、琢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为实现大联合是正确的出路。聂想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与“井冈山”谈判，但遭到以孙蓬一为首的强硬派的坚决反对。魏杞文则在校文革坚决支持聂元梓。聂曾一度想把孙蓬一拿掉，让他辞去校文革付主任一职。（江青曾对聂讲过，她有个“坏助手”是孙蓬一，聂想以此名义对孙采取措施。）索世晖告诉我，有一次聂、孙二人去高等军事学院的“红高联”军队首长那里吃饭，在饭局上，聂与孙商量必须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进而实现大联合，两人意见不和，越谈越激烈，后来孙勃然大怒，当着客人面，把饭桌掀翻。我后来对魏杞文谈到此事，魏告诉我，他知道此事，因为当时是三个人去的“红高联”，他也去了并在场。他当时与孙蓬一大吵了一架。孙指责魏杞文是“井冈山的内奸”。此事反映出当时校文革和“公社”内部两派思想斗争之激烈。

关于校文革、“公社”内部围绕大联合和武斗问题上的派别分野与斗争，尚未见到任何文章述及与评论。

## 2、关于两派的两个口号

文革结束后，北大学生在反思北大文革中两派打派仗的历史时，一部分人批评“新北大公社”有个错误口号“反聂即反动”，另一部分人批评“井冈山”有个“错误口号”“反聂即革命”。这两个对立的口号当然都很荒谬，不正确。实际情况是，在当年的现实中，这二个口号并没有真正出现过。两派头头和群众都没有公开提出过这种口号。这是文革后期以及文

革结束后，人们在反思北大文革两派打派仗的历史时，有的人对两派极端分子思想、行为的概括。

关于“反聂即反动”的口，这是文革后个别原“井冈山”校友硬按到“公社”头上的。聂元梓在1966年11、12月时曾几次针对“井”、“红”反校文革、反聂元梓，对校文革常委和“红旗兵团”骨干讲，炮打中央文革以上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是反动，炮打聂元梓不能叫做反动。但在打派仗时，以孙蓬一为代表的派仗强硬派，把“井冈山”反校文革视为错误路线，称反对派为“逆流”，其思想深处有着“反聂即反动”的意识。例如：校文革主办的校刊于1967年12月14日发表《社论》，说“井冈山兵团是孔、杨、牛、侯等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是走资派、反共老手的庇护所。”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刊登文章《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该文点了一批学生的名子，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

以上这种现象与“校文革”、“公社”一派中有较多文革前学生党、团干部这种成份有关。北大的运动在文革初期没有充分地分化，这与清华明显不同。“5、25”大字报贴出后，对陆平党委的保、反两派刚开始辩论、分化，仅仅8天，6月1日晚中央台就广播了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支持。于是全体师生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人都成了反陆平的造反派。在反工作组时期，从7月12日陈必陶贴出第一张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到7月25、26日中央文革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支持反工作组，保、反工作组两派的争论、分化才仅仅半个月，中央文革一表态，工作组撤走，全校师生一下子都成了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北大的保皇派始终没有形成气候。“保”、“反”两派没有时间形成组织上的对立。由于北大没有充分分化并形成明显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更没有在组织上形成“保”、“反”两派。因此在1966年8月以后便阵线不清。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原陆平体制中师生里的党团干部两派都有，在支持校文革的一派中这种成份多一些。

1957年反右以后，中国社会形成一种政治风气，反对基层某个领导就是反党。这种观点在文革初期1966年的8、9月被《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多次批判、否定，推动了风起云涌的造反大潮。但以前那些文革前的党团骨干中，这种思维习惯很难一下子根除。北大支持聂元梓的一派中，少数人（原来的党团干部）仍具有这种思维习惯，并以这种思维对待对立面。但应客观指出，“红旗兵团”总部及后来的“公社”总部从来没有认同过“反聂即反动”这一类的观点，他们只是不接受“井冈山”搞“二次革命”这种过左的做法。

关于“反聂即革命”，文革中“井冈山”虽没有公开提出这种口号，但少数头头确曾公开提出类似的口号，如：“彻底砸烂校文革！”、“进行二次革命！”、“井冈山是真正造反派！”“新北大公社是老保！”、“一切权力归井冈山！”等左的口号来做为行动纲领。少数人思想深处有着“反聂即革命”的意识。聂元梓在文革中是造反派的代表，是站在左的方面。“井冈山”的个别头头却把聂当做“保守派”来攻，当做右的代表来攻，嫌聂不够左，声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这恰恰表明他们的立场更左，是极左，是以极左反左。这即是个别人“反聂即革命”意念的荒谬之处。北大在文革初期的特点是什么？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北大运动走的太快，陆平很快倒了，工作组很快就挨批被撤了。按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北大暂时不存在革命的新目标。正如1966年11月13日李讷在北大对聂元梓传达毛泽东的话时所说：毛泽东说“北大运动不好再进一步做什么，北大的运动要等一等，现在主要是推动全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表示支持聂元梓去上海串联。（注3）但北大的某些激进派，比毛泽东跑的还快，比毛还左。他们要在北大再掀新的造反浪潮。要再造反，造谁的反，革谁的命呢？1966年底至1967年时，造反已成为一种时髦，造反

派的身份成了一种荣誉。于是北大的个别人便形而上地把矛头指向校文革、聂元梓，认为这是“革命”。其实这种“造反”、“革命”不但在当年与批资反路线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今天来审视则更是过左的表现，迎合了极左路线，与“反文革”是沾不上边的。“井冈山”的绝大多数人对此早已有所认识。

当年北大两派争论的焦点，从来不是上述的两个口号，而是聂元梓、校文革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井冈山”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这是当时事实上争论的焦点，即所谓路线问题。两派各自认为自己代表了正确路线，对方代表了错误路线。都认为“路线斗争不可调和。”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分胜负不罢休。此盖因中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毒太深之故。自己也曾相当长的时间内把对立派同学视为错误路线的敌对派别。直至两派武斗愈演愈烈，才逐渐觉悟，脱离派斗。

北大两派的所谓“路线斗争”是假宗派载体而进行。当年的派性泛滥于全国，派斗蔓延至各大专院校、中学、工厂、机关、医院、街道，甚至农村各个生产队。部队除做战单位之外，各总部、军事院校、文工团也分派，打派仗。派仗遍布全国，派性十分顽固。这是中共建国以来从没见过过的现象。对派性这东西有必要认真研究。

派性能突然高涨的条件是：毛泽东为着利用群众，打倒政敌，暂时实行了大民主。在文革开始后的前二年，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突然被打乱、打散、瘫痪，原来的社会控制系统解体、散架，例如学校的系、科、年级、班的系统消失，党、团组织瘫痪。中共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党中央对群众松绑了，于是群雄并起，造成派性大泛滥。这是外部条件。内在原因是什么？

当年派仗的硝烟弥漫全国各地。北大、清华这两个最高学府，都曾陷入长期的派性斗争，并发展至武斗。这种情景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这种社会现象暴露出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深藏着宗派性质的文化因子。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村基层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家族宗法关系。一村、一族、一姓，被宗法关系所联结。广泛存在的民间宗教团体，更是强化着草根民众的帮派性。民间的哥老会、袍哥等各种帮会盛行，普通成员抱团取暖，帮派头头则抢地盘，要保护费，争利益，具有黑社会的性质。城市中盛行着手工业者的行帮制，尤以糟运中的糟帮最为显赫。社会上层的科举选仕制，造成每期中举的新科仕子们与主考官之间的同学、师生关系网。官场、朝廷盛行朋党之风，一党一派，一兴俱兴，一衰俱衰。在中共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某某方面军出身，某某野战军出身，红区、白区出身，不同根据地出身，留苏国际派，国内游击派，等等山头，帮派林立。以至于在中共的组织原则中，“照顾山头”成了理所当然的潜规则。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蕴藏着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人身依附、小圈圈，以人划线、抱团结伙的传统。在一党专治的高压下，它们隐蔽地存在着。一旦松绑，能量巨大，便会泛滥。文革中派性之严重，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上的根源。

中共建政后的17年，一切财产归国家，没有私人产权。青年学生的人生前途、利益主要将决定于政治立场、政治表现、政治身份、政治地位。奉行的是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利益取决于政治。因此北大学生谁也不想在大革命中站错队，谁都想在大革命中表现自己是紧跟毛泽东的革命派。这是集体潜意识。在文革中阶级斗争观念泛滥的条件下，两派互视对方是错误路线、是政敌，而自己是政治正确，于是斗个你死我活，誓要分出胜负。当两派群众全被毛泽东抛弃，发配到工厂、农村、边疆进行思想改造，人们才逐渐醒悟，走出派性。

以上，是我对两个口号的看法，以及今日对文革中北大两派内斗之反思。

### 3、祖父被关押到秦城

1968年3月上旬的一天，母亲告诉我，祖父王卓然在3月5日被公安部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说他是“东北帮”的。如晴天霹雳，我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我爱戴的爷爷怎么一夜间成了历史反革命了？文革中我深受“血统论”、“出身歧视”的困扰，现在又要背上这么个大包袱，太沉重了。祖父为什么被抓进秦城？“东北帮”是怎么回事？后来我逐渐了解到，所谓“东北帮”是指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中共一批高级干部、高级将领和民主人士，大多是东北人。文革中左倾势力不承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认定他是反动的大军阀，认定中共党内有一批与他勾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中央及东北地区的专案组在北京和东北地区逮捕、关押了100多人。此即为“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俗称“东北帮”。

康生、江青、毛远新等人和中央专案组，完全无视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他们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从阶级分析出发，认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高于一切。因此认定张学良是敌对阶级的“反动大军阀”。他们在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要挖出一个与张学良相勾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

此案与延安整风有关。康生在延安整风时发明了一个名词叫“红旗党”，意指暗藏在中共地下党内部的叛徒、国民党特务，打着红旗反红旗。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曾抓了不少“红旗党”，其中包括许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总”）的中共地下党干部和从张学良东北军出身的红军将领。康生在延安整风中有一个“抢救失足者”报告的小册子，其中就点名称“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党、特务。”“东总”地下党组负责人刘澜波在延安整风中便因“叛徒”、“特务”嫌疑而被关押、审查。“东总”如是“红旗党”，直接领导“东总”的周恩来成了什么？文革中康生故技重演，整肃当年“红旗党”中的东北人，特别是当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骨干，即所谓“东北帮”。67年底、68年初，在北京和东北地区，公安部抓捕了大批“东北帮”入狱，逮捕、关押了上百名高干、高级将领和著名民主人士。此案件应是文革中次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大案。“六十一人案”直接牵涉到刘少奇，而“东北帮案”则暗中牵涉到周恩来。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七七事变”前夕，张学良的一些文官亲信、下属以及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在北平组建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宗旨是坚决抗日，光复东北老家。“抗战时期“东总”在重庆，是直接由周恩来的中共南方局所领导。“东总”的地下党负责人是刘澜波、于毅夫，中共战略情报员阎宝航和祖父王卓然同为“东总”主席团的理事，王卓然兼任“东总”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社的社长。王卓然是由周恩来提议让他以有影响的社会贤达身份成为“东总”主席团的成员，以便于在国统区进行公开活动并广泛团结民众抗日。

“东总”的骨干大多与张学良有着历史渊源。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曾放风说，周恩来在重庆“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康生打击“东总”，剑锋所指是周恩来。康生敢如此胆大妄为，应是有后台。1943年周在延安整风中，被毛泽东从重庆叫回延安，被批，挨整，反复检查路线错误，直至“七大”召开方止。（注4）1967年底、1968年初，康生在文革中，又一次翻出“红旗党”旧案，打击“东总”的新名称叫“东北帮”。中央专案组抓捕了大批东北籍的叛、特、反。原历史上的“东总”骨干刘澜波（水电部部长）、于毅夫（统战部部长）、阎宝航、高崇民、贾陶、民主人士王卓然以及原东北军将领中后来参加中共的张学思将军（海军参谋长）、万毅将军、解方将军等人都做为“东北叛、特、反黑帮”被关押到秦城监狱。江青、康生、毛远新在东三省打击“东北帮”面积更大，

制造了一个有九十六人的“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有陈先舟（辽宁省副省长）、吕正操（铁道兵司令）、赵承金（辽宁省军区司令）、车向忱、宋黎、卢广绩、栗又文、宁武、张庆太、刘多荃、刘鸣九等高干、高级将领和民主人士。把他们投入监狱审查。矛头又一次指向“东北帮”的所谓后台周恩来。康生、江青、毛远新敢这么干，是有所仗持。

联想在北大文革中，于1967年中至1968年，从地派及北大“红旗飘”个别人口中传出的“周恩来是旧政府的代表”、“是保守派的总代表”的极左观点，应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一切并非偶然。

祖父王卓然简历如下：王卓然，字回波，1893年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莲岛湾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官派留学）。1928年7月，王卓然在美国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老家沈阳。张学良将军知道王卓然回国后，即聘王为“谘议”。王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大学秘书长及代理校长，张学良将军家庭教师，“东北外交研究会”主任，《东方快报》社长。王卓然成为张学良将军的重要文官幕僚、亲信，被称为“东北三老”之一，即阎宝航、高崇民、王卓然三人成为张学良最重要的文官助手。抗战爆发后，王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理事，《反攻》杂志社社长等职。1946年5月4日，王卓然与许德珩等发起成立“九三学社”。1948年1月赴日经商，1951年5月返回祖国，1955年被周恩来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68年遭四人帮诬陷，受所谓“东北叛党集团”牵连被逮捕，关押至“秦城”监狱，1972年保外就医，1975年1月31日因病去世。197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党组做出《关于王卓然先生的复查平反结论》，表明“王卓然是爱国民主人士，为党和人民作过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以军统特务嫌疑问题而逮捕审查，是一件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王卓然的追悼会，邓颖超送了花圈。

祖父于1972年保外就医后，曾陆续对家人谈到他被关在秦城时的一些情况。专案组要祖父招供，承认是国民党军统局的“设计委员”，是特务。因是不实之词，祖父始终没有承认（这一诬陷罪名后来被完全推翻）。专案组审查人员曾反复逼迫祖父揭发于毅夫（中共统战部部长，当年“东总”地下党党组负责人之一）是特务，祖父始终不肯诬告、不肯做伪证。审查人员威胁祖父，如不肯配合，“不老实”，就要给他拷上手拷。（每天24小时戴手拷是狱中折磨人的一种严重惩罚，被拷者行动极不方便，很难受）但祖父没有屈服，他对专案人员说“于毅夫是好人，他没什么问题。我写不出他有什么问题的材料。”而后祖父被戴上了18天手拷。祖父说，他时常在半夜听到有人惨叫，应是在用刑。祖父出狱后才知，当时东北三老，他和老朋友阎宝航、高崇民同时被关在秦城，但从未见面。阎宝航于1968年5月间死在狱中，他在深夜时被提审，看守人员从背后将他踢倒在地，从此再没站起来。死后竟然骨灰都没有留下。

阎宝航是传奇式的英雄、中共红色战略间谍，曾屡建奇功。他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实为中共秘密党员，与周恩来单线联系，联络员是刘澜波。阎曾获得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而后周恩来把阎获取的这一重大情报，通过延安电告了斯大林，在德军全线进攻苏联前八天通知了苏联统帅部。1945年8月9日苏军进攻日本关东军前，阎获取了关东军在东北中苏边境布防的全部资料，通过情报员交给了苏联驻重庆大使罗申。从而使苏军在8月9日发动攻击之时，已对关东军的要塞地点、地形、兵力布署、武器配置、指挥员姓名，了如指掌。不幸的是，这位英雄却在文革中死在了秦城监狱，尸骨无存。

祖父去世前半年，在家里曾与我有个重要谈话。我把它视为最后的交待。

祖父从秦城保外就医出来后，与我们住在一起。1974年夏季的一天，祖父对我讲：“复兴，爷爷告诉你一件事，一个历史。张学良会开飞机，1936年3月下旬，张学良亲自驾飞机，从西安带我到洛川，两人在洛川密谈了三天。那段时间张少帅曾多次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蒋就是不听，张学良很苦恼，也很愤怒。表示要逼蒋抗日。和我商量怎么办。当时俩人都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兵谏’一条路可走。”“兵谏”，这是张学良与王卓然在洛川密谈中达成的共识。张将军在“双十二”前，单独约见一个亲信智囊仅此一次，这发生在“西安事变”前八个多月。很显然，此时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决心已定。祖父亲身参与了这一改变中国命运重大事件的谋划。祖父王卓然行事一贯低调、从不宣扬个人。他对我讲的这件事，他以前从未讲过。至今也没见诸于任何文章。我曾查阅祖父在五十年代写给国务院参事室的自传，那是改造思想、向党交心、自我审查历史性质的自传。其中确有提到他与张学良在洛川密谈一事，但没有提到密谋“兵谏”。我想这个自传既然是检讨个人历史，就不便写功绩吧。王太学先生著作的《王卓然传》也证实有张、王二人洛川密谈一事，但也没有涉及“兵谏”。张、王二人的洛川之行，行踪相当诡密，躲开西安，张没带副官和侍卫，亲驾飞机到洛川，二人单独在小层里谈了三天。这应是出于高度保密的需要。当年参与洛川密谈的当事人只有两人：张将军和祖父，两人现在均已做古。我只能从1936年12月12日及13日二天发生的事来反证此事。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将军扣蒋之后召集东北军、西北军众将领开会，慷慨陈词，张将军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张将军和众将领一致认定：此次事变为“兵谏”。并随后电告全国，宣布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举行“兵谏”，提出八大主张。在张、杨对全国的通电中，反复提到，这次事变是“兵谏”。13日晨五时天未亮，王卓然在北平床头的电话急响，王卓然得到张已扣蒋的消息后，立即断定是“兵谏”，并命令他主持的《东方快报》马上改版，用头版大标题说明西安事变是为停止内战，逼蒋抗日，而举行“兵谏”。当时国统区的报刊全是一边倒斥责、声讨张将军为叛乱的宣传，包括国外的莫斯科《真理报》也指责张将军是叛乱。唯独王卓然为社长的《东方快报》在国统区揭示了真相，使用了“兵谏”字样。当年在北平的王卓然与在西安的张学良于关键时刻高度默契。显然“兵谏”的念头早已分别藏在他们的胸中，因此王卓然在关键时刻才会脱口而出并变为行动。王卓然在12月13日清晨，在得知事变发生的一瞬间，立刻准确地断定是兵谏，并逆舆论大潮，在所主持的《东方快报》上高呼这是为抗日救国爆发的兵谏。王卓然在12月13日的反应及行动，说明他并不是心有灵犀，而是胸有成竹，早有预案！

2011年8月，在辽宁省抚顺市的平顶山纪念馆举办了一个“王卓然生平事迹展”及《王卓然传》（王太学着）一书首发仪式的新闻发布会。我和兄长王复东、小弟王复强应辽宁省档案局和抚顺市档案局的邀请，参加了此次活动。会后有个关于王卓然的研讨会。以上关于张、王洛川密谈的史料，是我在研讨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

我记得弟弟王复明也曾对我提及祖父与他谈过关于洛川密谋“兵谏”一事。为此，我曾给王复明发电邮询问详情。王复明于2011年8月28日给我回电邮，说“爷爷生前也与我长谈过，时间也应是在1974年夏天。因我记得是在兵马司胡同家里的院子，分别坐在椅子上谈的。爷爷提及在1936年初张学良通知他从北京来西安，然后自己开飞机带他一人到洛川密谈一事。主要谈如何解决蒋不让张的部队去抗日而在西北打红军的问题。我清楚记得爷爷对我讲，他对张学良提到‘兵谏’。由于36年过去了，他具体如何说的我记的模糊了，我记得他对我说‘我对张学良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历史上也有用兵谏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

祖父去世后，张学良曾应父亲王福时之邀，寄来他手书的“王卓然故居 张学良书”的墨迹，寄到祖父去世时居住的北京市西四兵马司胡同的住宅。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